

随思录

罗浩声

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快往往代表了先进、成功，而慢则代表了落后、落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按照邓小平同志“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的要求，从解放思想入手，打破计划经济藩篱，通过改革和开放释放活力，经济增长一路高歌猛进，成就令世界瞩目。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快速发展，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如今出门可以走高速、坐高铁、乘飞机，速度提升、选择多样、换乘便捷，时空距离不再是问题。这样的快，顺应了民众的期待。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过去一个时期，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快”所影响和主

宰。吃饭，有快餐，点几样小菜，几分钟就能解决问题；欣赏音乐，有快歌，歌词未必听得清，年轻人要的就是那个味；邮寄物品，有快递，路程近的当天即可送达；购物，可以足不出户，上网“秒杀”；上学，有“快班”，老师一学期能把几个学期的课都给上完；节目主持，有语速比拼，一般新闻播音语速每分钟300字左右，浙江卫视主持华少据说一分钟能飙400多字；就连结婚这等大事，也有追求效率的，社会上管这种现象叫“闪婚”。

在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对“快”保持几分理性。古人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太急功近利了，很可能事与愿违。像有的人喜欢开快车，经常把马路

当赛车场，结果是东擦西碰，惹了事端，赔了钱财，害人害己；有的家长绞尽脑汁让孩子挤进“快班”，可拔苗助长的后果是扼杀了他们的学习兴趣；有的人为了赚“快钱”，不惜触犯国法、挑战社会底线，最终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有的企业只顾眼前之利，习惯跟在别人后面模仿，不愿意在研发创新方面投入，以至被淘汰出局……不掌握快与慢的辩证法，早晚是要吃亏的。

反对一味求快，也并非是要随遇而安、不求作为，而是说要少一些浮躁心态，少一些功利色彩，多一点脚踏实地，多一些遵循基本规律。最近几年，伴随互联网迅猛发展，有些“网络大V”一有社会事件，不管三七二十一，立马跟评，结果背离事实、

洋相百出。《宁波日报》时评版的“张弓慢评”专栏，反其道而行之，坚持“不求写作最快，但求论述更深，角度更新”，有的时候写作虽然“慢人一步”，但观点或角度却“胜人一筹”，所评更具针对性和可信度，因而受到读者肯定，这也颇能给人以启发。

需要处理好快和慢关系的，也包括一个地方的发展。过去，有的地区片面追求增长速度，“拍脑袋”决策，草率上项目，留下一堆落后产能不说，还把生态环境搞得一塌糊涂，后人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来收拾烂摊子，这显然是不行的。反过来，城市之间都在竞争，别人已经实现“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你还是小富即安，不紧不慢、坐等机遇，那也是不行的。现在从上到下都在

强调高质量发展，我理解所谓的“高质量”，就是要多一点基于科学、理性、稳重、有序基础上的“快”，就是要多一点真正看清楚、搞明白之后的“快”。发展不能只求速度，也不能完全无视速度。

快和慢，从本质上看，是不同的速度和节奏，但它们并不是完全对立和冲突的。这两者，可以彼此依存、互相调和。就像时钟，时针和分针按着各自的角度行走；就像音乐，激昂和悠扬的曲调表达着兴奋与深情；就像舞蹈，刚柔相济方如行云流水；就像竞赛，快攻和慢打都是一种策略。一个人也好，一个地方也好，只有遵循规律、快慢有度，收放自如、张弛有序，才能行稳致远。

说法

环保税其实并不是一个新东西。大家一听到环保税三个字，就会觉得是个新增的税种，很排斥。其实这个税就是我们说的排污费。收费只是一个行政规定，改成税制后，就有了法律依据，从而更加规范，既能帮助治理改善环境，又不至于对企业造成不可承受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这样对政府也有一定的规范和制约，以前老百姓常说乱收费，为什么？因为费是由行政执法人员来制定的，但现在有了环保税法，就必须依法来收，从而可以杜绝环保领域乱收费现象。

——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

历史的车轮飞速前进时，会碾碎陈旧腐朽的东西，也可能伤及路边的鲜花小草，这就是历史进步的代价。毫无疑问，我们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令人不满意的现象，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措施逐步扭转，把它说成是五四运动和中国革命的罪过，仿佛一百年来我们只要仍然坚持读四书，行古礼，一切都率由旧章，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用革命变革，中国就比现在更好，这简直是痴人说梦。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吸取智慧，但不是向古代去。“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在古代尚且行不通，现在更行不通。如果一切以儒学之是非为是非，以儒学为衡量历史的尺度，由此认为一百年来，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这是荒谬的历史观。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一级教授陈先达

当前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有三种状态：第一种是仍然以过去创业的经验来制定经济条件下依靠政府、政策来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完全忽视当今市场的变化和现代个性化消费的需求。第二种是对企业精神理解不全面，以偏概全。以为实干、创新加上工匠精神就可以。对社会责任缺乏了解，因而感到迷茫。第三种是面对日益发展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高科技产业、面对全球市场的供需变化，不求深入了解，随大流、看风向、靠政策、找政府，危机感不强，战略意识不够。这是较为普遍也更令人担忧的企业家状况。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在这些企业家的背上猛击一掌，大喝一声，这种落后于时代的理念、想法和思想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越早摒弃旧的思想，越会赢得主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数字

破万人

——查处问题7594起，处理10672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329人……日前公布的2017年12月份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数据显示，查处问题数、处理人数、党纪政纪处分人数均为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五年以来的单月最高。其中，单月处理人数更是首次突破万人。

150%

——线上服务消费交易挽救了网购增速放缓的颓势，家政订单涨幅更让人意外。国内知名线上家政服务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7月，线上家政订单量与平台家政员的数量，两者均保持着150%涨幅。

168个

——数据显示，70%的中国游客春节将选择出境游，在这种情况下，凭借已覆盖168个国家和地区银联卡受理网络，银联卡服务也成为境外商家欢迎中国游客的重要方式。22个国家和地区的热心商家在春节期间将为银联卡持卡人提供最低七折的专属优惠。

“快”与“慢”

世象管见

“民生工程”与“名声工程”

吴启钱

有一次，笔者到一个社区调研，可能是没听仔细，几次把工作人员口中的“民生工程”听成了“名声工程”。不过转念想想，虽然听的或有不对，但在某些基层领导眼里，“民生工程”还真是“名声工程”。

民生工程易得名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基层组织把工作重心放在民生工作上，解决了群众就业、就学、就医、出行、养老等方面一大批问题，群众获得感和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大幅提升。一些在这方面成绩卓越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一些重视民生工作的基层单位成了八方参观的学习典型。正可谓内部名声很正，外部名声更好。

然而，也有一些地方和个别干部，把名声看得重于民生。民生工作在名称、形象等方面体现领导个人水平和意志的自由度比较大，特别是在“八项规定”执行越来越严的形势下，用民生工作捞取名声，往往是最“合算”的。因而，一些基层单位和个别领导干部往往把民生工作作为所谓工作创新的“切入点”，作为获得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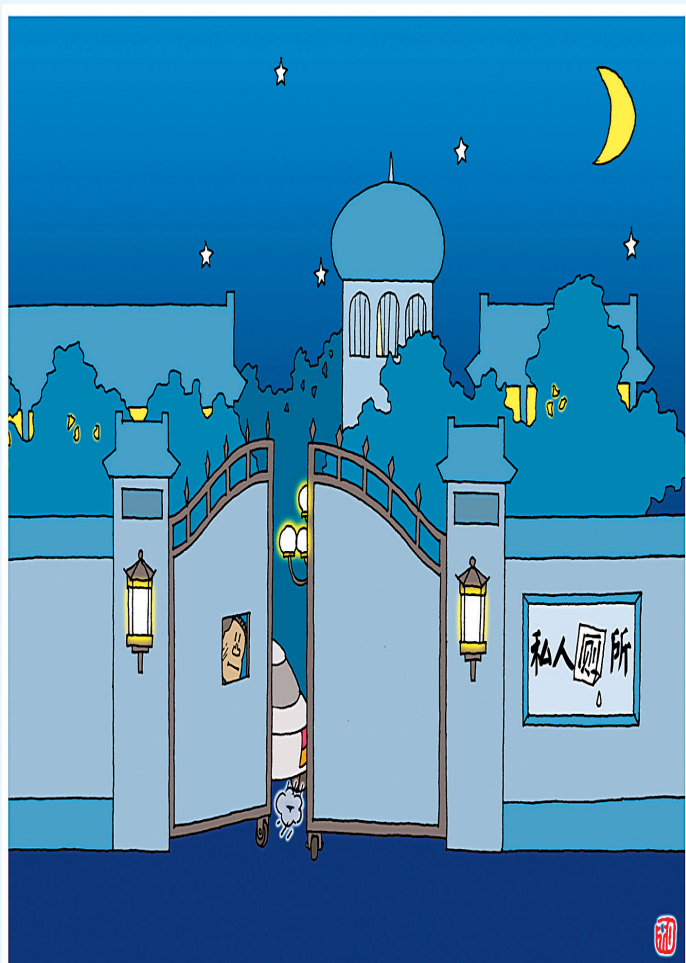
政绩的手段和获取个人名声的载体。

比如，在民生工作中，重形式胜于重内容，重名称胜于重实际，重“包装”胜于重实施。项目要新颖，名称要响亮，档次要高大，包装要洋气，宣传报道要密集。不仅一任领导有一任领导的“民生实事工程”，就是同一个领导，不同的年度也会有不同的点子和项目，哪怕上一个项目都还未出成果。一些民生项目开始包装和宣传的时候很漂亮，但结果却只做出一个可看的点，普惠性不强，实效性较差，“盆景”有了，“风景”一直未见。甚至，一些项目由于后续投入和管理跟不上，成了半拉子工程，浪费了资源，留下了麻烦，折腾了群众，损害了公信，甚至变成了包袱，增加了政府负担。这样的结果是，领导的名声有了，但群众的实惠不多，一些民生问题仍然还是问题。这样一种“假做民生，真为名声”的做法，说轻了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新表现，只求轰轰烈烈，不求实实在在，只求做过不求做好。说重了也是一种腐败，本质上就是用公权公款谋取个人好处。

要解决这个问题，得从多方面着手。首先，应教育基层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名利观。重形式，获名声，得名声，这是正循环，也是基层一种良好的政治生态。但不能为了名声累了民生，忘了民生，更不能戏弄民生。其次，对领导干部的考察评价，不只要听显露在外的名声，更要听取群众心中的心声。群众的口碑胜过金杯银杯，群众的眼睛胜过媒体的宣传。是不是真心为群众办实事做实事，群众最有发言权。第三，民生工作的谋划立项和决定实施，要更多体现群众的意愿与需求。近年来，很多基层政府已经由人代会通过票决的方式参与民生工程的决策和实施，更多体现人民的意愿，使民生工作民意基础更扎实。在这样的基础上，民生工作会更受群众欢迎，参与民生工作的干部，获得的名声也会更大、更持久、更名副其实。

民生工作既能为群众带来实惠，也能为基层干部带来好名声，是多赢的工作。关键是要通过制度和机制的完善，把实事做好，把好事做实。

漫画角



整“盖”以后

(王祖和 绘)

社科书架

人和猿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是否“携带工具”

朱晨凯

《哲学起步》根据作者2013年在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时，给外系（主要是法律系）本科生讲“哲学导论”课的课堂录音整理而成。本书和其他哲学类书籍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要带领年轻人从一些公认的常识或日常经验进入到一种哲学思考，特别是对如下三个问题的思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分别构成了本书的三个主题或三章，即人的本质问题、自我意识的本质问题、自由的本质问题。

作者在《哲学起步》的后记中指出，本书最重要的创新之处，在于把全部哲学都建立在有关人类起源的一种新观点上。这个观点是：人的本质定义以及人

和猿的区别应当修订为“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书中指出，以往人们对人的本质的描述大都是一条一条地罗列：人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人能直立行走，人还有语言和理性，人还有历史和文化，人又有自我意识等等，但是这些要素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就语焉不详了。本书则用一个“携带工具”以及它所具有的哲学含义（中介）和符号形态，把所有这些要素统统联系和贯穿起来，置于一个层层推进的逻辑层次之中。从哲学的目光看，携带工具表明：人类已经把某些自然物看作他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他与自然界之间已经产生了一个“中介”。这个中介既是自然物，同时也是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是他自己可以自由

支配的。

书中对“携带工具”这一现象的哲学意义展开了系统的大规模的论证，尤其是它与形成语言和自我意识结构的密切关系，这是前人未曾注意到的。运用这一观点，作者解释了一系列人类现象，如人为什么能够用火？“野人”是不是人？婴儿生出来为什么要大声哭叫？人的语言和动物的“语言”到底有什么区别？由此进入人的精神和自我意识的构成，以及人的自由的起源和发展。

但作者也指出，所有这些，都还属于哲学的“起步”，当然已经是哲学了，但还没有进到纯粹哲学，而是为纯粹哲学做铺垫、做准备。《哲学起步》在探讨一系列问题后，落脚点在于“自由与逻辑”，即有关方法论的问题，这与康德和黑格尔的做法

如出一辙。康德“三大批判”每一批判的最后部分都是“方法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也是以方法论结束。作者认为，这或许是打开一切现实问题的最根本的钥匙，或许也是切入一切现实问题的方法。对于一个哲学体系来说，方法总是在先的，作者提出应建立的哲学，就是要在本源的方法后面揭示出现实的内涵，使它成为我们能能动地对待现实问题的一种新型的世界观。

《哲学起步》的内容始于人类起源的新解，止于方法论的探讨，是作者构建个性化哲学体系的尝试，也是一种古典而现代、朴素又深入的智慧思考，对于初步接触哲学领域的新人颇有帮助。作者认为，哲学之于今天的我们并不遥远，它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真正的自由是在人类进入到文明时代，有一部分人（如贵族或奴隶主）能够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专门从事精神生产，进行完全超功利的真善美的追求时，才按照其本质而向人呈现出来的。但它起源于在物质生产劳动中所预先蕴含着的自由的因素，即暂时地、有限地超越于物质需要的因素，而不是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店提供)

【精彩书摘】

情感，从而人能够建立起整个真善美的精神大厦。而这一精神大厦的根本特点在于对现实事物的超越性和理想性，它是立足于人的自由之上的。这就涉及人的自由的起源。携带工具本身就显示出人对眼前利害的超越性，他将某种目前暂时看不出有什么好处的东西（工具）随时带在身

上，将它视为自身的一部分（延长的手），即使在不用它时要耗费一定的精力也不能丢弃它。这种习惯使他的行为具有动物所不可能有的远见和整体的策划，也就是超出临时的需要而为未来的需要作长远的考虑。人在这种目的和手段的链条中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即他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为所欲为，不受眼前需要的支配，成为自然的主宰；但最终仍然受制于本能的生存需要。

■“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这一提法的优势在于，它既可以和传统的提法“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兼容，又避免了由于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发现黑猩猩也能制造和使用工具所造成的人猿之别问题上的大地震，同时还巩固了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经典论断。除此之外，这一提法本身不是一个单纯实证的或考古学上的发现，而是一个哲学（哲学人类学）的发现，它不

单对人和猿的区别作出了清晰而确定的划分，说清楚了人由于要携带工具而不得不两腿直立行走的必然性，而且由此深入到了人性本身的本质结构，借此来解释语言的诞生和历史的形成，以及剖析自我意识的结构和自由的起源。这些都显得比以往的解释更加顺理成章，也更有根基。

■人和动物的区别到了高层次，就是从动物的表象、欲望和情绪提升到了人的概念、意志和